

2026-GB-E010
IDN/ODI/RAR



区域国别研究报告

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

2026 年 6 月 27 日

中资企业“出海”印度尼西亚的风险评估

复旦大学

上海市企业走出去综合服务平台

《**区域国别研究报告**》是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依托上海市各高校和科研院所专业研究力量，紧扣服务企业走出去现实需要，专为“上海市企业走出去综合服务平台”打造的区域国别研究品牌。

《报告》基于学者“在地研究”田野调研、企业出海实务经验以及其他信息，聚焦国别/区域、产业/行业、在地合规运营三类场景，推出三类系列成果。其中，“**国别报告**”系列以对象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内容为研究对象，重点围绕宏观经济形势、营商环境、中资企业经营状况、机遇挑战等维度，解析对象国各领域的发展态势，为企业海外布局提供决策参考；“**行业报告**”系列针对重点产业跨境布局或企业走出去的行业赛道，深入研判对象国的重点行业发展格局；“**合规报告**”系列回应企业海外合规运营实务关切，系统梳理对象国重点领域的监管要点，为企业在地运营提供应对策略参考。

摘要

当前，印尼正从“初级资源输出国”向“区域制造中心与数字枢纽”转型，中印尼经贸合作已跨入“全产业链融合”的新阶段。但印尼营商环境呈现“两面性”：一方面，其庞大的人口红利、数字消费蓝海以及基于“下游化”战略的产业政策吸引诸多投资商；另一方面，基础设施瓶颈、政策落地困难大制约企业投资回报。建议企业“出海”做好以下工作：一是战略升级：依托“两国双园”等特区采取“产业链集群出海”。二是深度本土化：建立明确的“外籍员工替代与梯队培养”机制，将环境、社会、治理(ESG)转化为获取社会信任的“保护伞”。三是合规与公关：设立前置化合规尽调机制；建立立体化政媒朋友圈，切实维护中资企业品牌与声誉。

目 录

一、营商环境现状	1
(一) 产业政策三大核心	1
(二) 营商环境呈现“两面性”	5
二、中资企业现状	9
三、主要风险	15
(一) 劳资纠纷与跨文化治理壁垒	15
(二) 生态环保压力与社区利益分配冲突	15
(三) 国际经贸规则调整与东道国政策变化	16
四、企业出海建议	17
结 语	23
文献来源	27

一、营商环境现状

当前，印尼正处于从“初级资源输出国”向“区域制造中心与数字枢纽”转型的历史节点。其宏观政策、营商环境与中资企业在当地的布局，呈现深度捆绑与快速重塑态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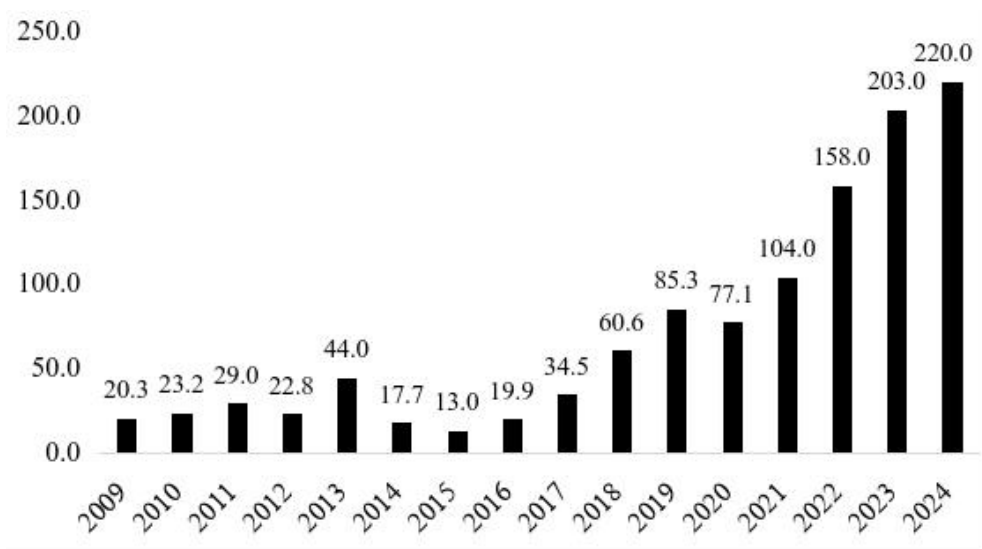
（一）产业政策三大核心

近年来，印尼推行了一系列旨在吸引高质量外资、推动产业升级的结构性改革。其经济政策逻辑已从传统的“放任资源出口”坚决转向“强制产业留存”，围绕三大轴心展开：

1.资源“下游化”驱动产业链重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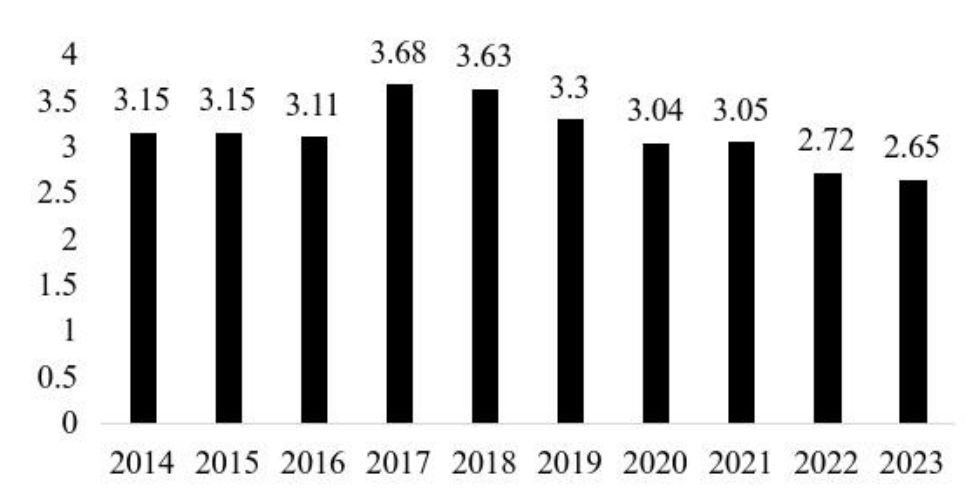
印尼拥有极为丰富的自然资源储备，其中镍储量约占全球的 42%，位居世界第一。基于此，印尼政府确立了资源“下游化”国家战略。该战略是利用资源垄断地位，倒逼国际资本将冶炼、加工乃至高附加值制造环节落地印尼国内。自 2014 年首次实施原矿出口禁令以来，印尼通过多次修订《矿产与煤炭开采法》，不断强化对资源出口的管控。特别是 2020 年全面恢复镍原矿出口禁令，推动全球镍产业链加速向印尼集聚，促使印尼在数年间跃居全球

最大镍铁与不锈钢生产国之一。如图 所示，受 2014 年及 2020 年两轮原矿出口禁令驱动，印尼镍矿开采量呈显著加速态势，直观反映了其“强制产业留存”政策的落地效果。当前，这一“强制下游化”策略正被复制推广至铝土矿、铜、锡以及农林产品（如棕榈油精炼）等更广泛的领域，构成了最鲜明的产业政策红利与准入门槛。除镍矿外，印尼在煤炭、橡胶等领域的资源禀赋同样为其吸引特定外资提供了重要筹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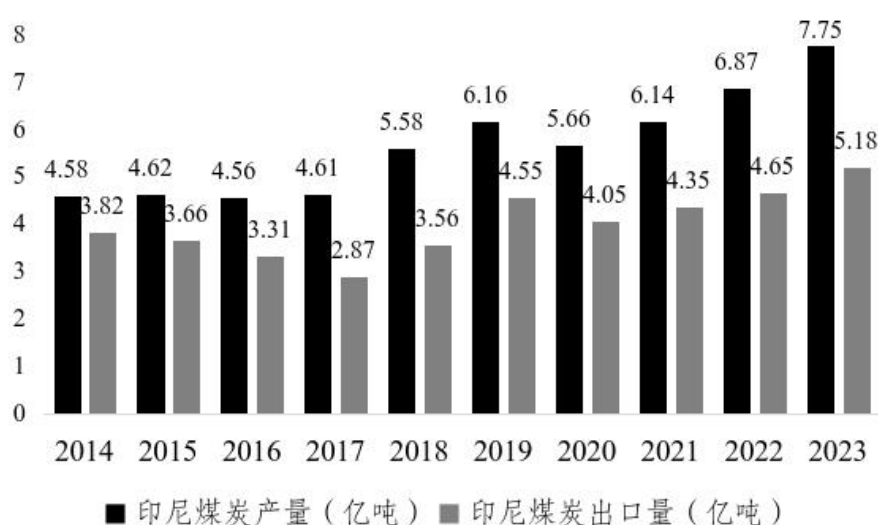
2014 年印尼实施“下游化”战略后镍矿开采量呈爆发式增长（单位：万吨）

数据来源：美国地质调查局（U.S. Geological Survey,USGS）



2014—2023 年印尼橡胶总生产量（单位：百万公吨）

数据来源：Statista



2014—2023 年印尼煤炭产量和出口量（单位：亿吨）

数据来源：印尼能源和矿产资源部

2.绿色能源转型与本土化诉求

作为全球最大动力煤出口国，印尼长期依赖煤炭发电。但近年来，政府正加快能源转型步伐，提出到 2025 年将可再生能源在能源结构中的占比提升至 23%，并计划在 2040 年逐步淘汰燃煤电厂。围绕这一目标，印尼出台了《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法》，为光伏、地热等项目提供最高 20 年的企业所得税免税期，并在地热等部分领域允许外资 100%控股。

电动汽车方面，印尼致力于打造全球第三大电动汽车电池生产商。政府出台产业路线图，力争到 2030 年实现电动汽车保有量 200 万辆、电动摩托车 1300 万辆的宏大目标。为强化产业吸引力，印尼在 2021 年推出的投资优先清单中将电动车列为重点，对投资企业提供“5+5”税收优惠（即前 5 年全免、后 5 年减半），同时针对本土消费者提供约 700 万印尼盾的购车补贴。这种通过财政补贴与税收减免双向发力的绿色政策，极大刺激了外资的涌入。

3. “创造就业法”与营商制度松绑

在营商制度改革层面，2020 年印尼通过《创造就业综合法》（下称“创造就业法”）。该法案对 70 余部现有法律进行修订，大幅削减外资准入限制，将传统的“负面

清单”转变为“正面投资清单”（除少数涉及国家安全的领域外，绝大多数行业向外资开放）。法案在简化商业许可流程、放宽外资持股比例、优化外籍劳工雇佣程序等方面释放了强烈信号。此外，政府着力打造新首都努山塔拉，将其定位为“智慧、环保”的超级工程，并为参与新首都建设及入驻国家级经济特区的企业提供极具吸引力的税收豁免政策。

（二）营商环境呈现“两面性”

综合世界银行、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等国际权威机构的评估，以及大量中资企业的微观经营反馈，印尼投资环境呈现出“两面性”：宏观人口与资源底座极具吸引力，但微观运营层面的基础设施与治理效能仍面临严峻约束。

1. 人口红利与数字消费潜力

印尼 2.8 亿人口中，15 至 64 岁的适龄劳动力占比达 71%，年龄中位数仅为 30 岁。这种极度年轻化的人口结构，不仅为制造业和服务业提供成本极低的充沛劳动力，更孕育了庞大的内需消费市场。预计到 2030 年，印尼中产阶级新增规模将达 7500 万人。

更为突出的是，年轻人口红利直接催生了数字经济的爆发。最新行业数据显示，印尼互联网普及率已超 80%，电商市场规模从 2020 年的 182 亿美元飙升至 2024 年的 408 亿美元。庞大的网民基数、高度活跃的社交媒体生态，使印尼成为全球互联网企业、新消费品牌（如新式茶饮、美妆等）出海的最佳试验田与高增长引擎。

2. 基建物流瓶颈与“捆绑投资”重负

作为拥有 1.7 万个岛屿的群岛国家，印尼在交通互联与物流运输上面临天然的地形割裂。2023 年全球物流绩效指数显示，印尼仅排名第 63 位，进口货物平均停港时间长达 8.2 天，落后于马来西亚和泰国。

在能源基建方面，除爪哇岛外，外岛地区（如苏拉威西、加里曼丹等矿业重镇）电网容量脆弱，电力供应的可靠性严重不足。2019 年雅加达及周边地区曾发生波及 3000 万人的停电事件。这种基建短板直接导致了投资成本的外溢。为保障生产，大批投资制造业和矿业的中资企业不得不采取“捆绑投资”模式——在主业之外，被迫投入巨资自建专用港口、燃煤电站及大型工人宿舍。这不仅推高企业准入门槛与沉没成本，也为后续环保达标（如企业自备燃煤电厂的减排压力）埋下隐患。

3.政策波动性

印尼的行政与监管环境是投资者的最大痛点。印尼在部分国际机构的治理效能评估中得分偏低，行政透明度仍有提升空间，行政许可层次繁多且程序复杂。尽管中央层面推行在线单一提交系统（OSS），但中央政策在落地时，往往因地方政府在林地许可、环境评估、土地规划上的自由裁量权遇阻。以矿业投资为例，获得矿业许可证仅是第一步，后续各项环评与用地审批平均耗时 6-12 个月；而在某中资新能源材料公司的实际运营中，曾因尾矿库审批未获放行而被迫减产，凸显“证后审批”的复杂性。同时，政策的波动性与回溯性调整也是威胁。由于受制于财政压力，印尼在煤基燃料界定、资源型出口外汇强制留存、特许权使用费标准等方面不时进行政策微调，这让企业难以形成长期的收益预期。

4.人力资源问题

印尼在劳动力数量上优势显著，但在质量与产业升级需求之间存在深刻矛盾。印尼劳动力整体受教育水平和外语能力有待提升，企业在跨文化管理方面需投入较多资源。

更为严峻的是技能供需错配。在能源、数字化及高端

制造等前沿领域，高素质技术人才极度稀缺。相关调研显示，超三分之二的在印企业面临技术类岗位招聘困难。以光伏行业为例，由于产业飞速发展而本地工程师匮乏，雅加达熟练光伏工程师的年薪在3年内从15万人民币暴涨至25万人民币。这使得企业在享受低端劳动力红利的同时，必须承担沉重的内部技术培训与人才流失成本。

二、中资企业现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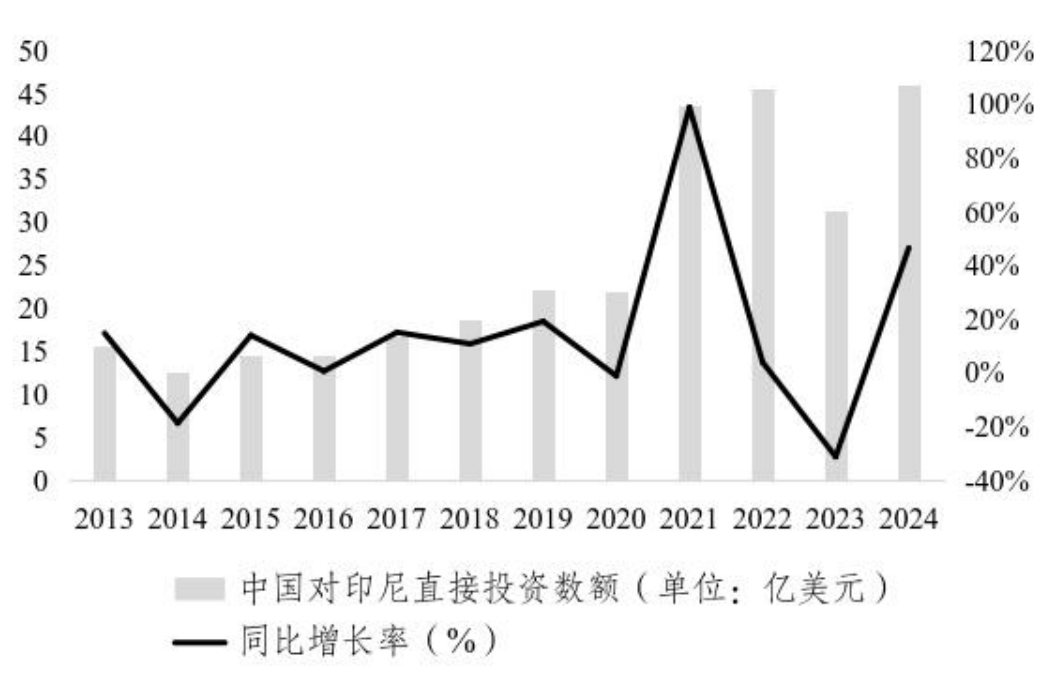
当前，中国对印尼的直接投资已全面超越早期简单的“商品输出与低端产能转移”，呈现出规模跃升、链条重塑、主体多元的崭新特征。

1. 投资向“高附加值产业链”跃升

2013年以来，中国对印尼直接投资步入爆发期。2021年起，受新能源产业链深度绑定及经济特区政策红利驱动，中国对印尼投资规模进入新的“爆发增长期”。据《2024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数据，2024年，中国对印尼的直接投资流量为45.9亿美元，连续9年稳居印尼前三大投资来源地。

同时，中国对印尼投资的行业结构也正在经历一场质变。早期，中企投资高度集中于煤炭开采、初级金属冶炼及传统工程总承包（EPC）。而当前，投资重心已坚决向深加工与高附加值环节延伸。在新能源与制造领域，中资企业正顺应印尼“下游化”战略，构建起从“红土镍矿开采—镍铁冶炼—电池材料—新能源整车制造”的完整生态闭环。例如，宁德时代携手印尼国企投资近60亿美元建设动力电池全产业链项目；比亚迪、上汽通用五菱、奇瑞

等中国车企相继建厂投产，其中中国品牌已占据印尼电动车市场超 90% 的份额。在能源领域，从神华集团等主导的爪哇 7 号大型环保煤电项目，逐步向隆基绿能、天合光能等参与的光伏组件及水电、地热项目转型。在数字经济领域，阿里、腾讯、京东等科技巨头通过股权投资与技术赋能，深度融入印尼本土电商（如 Tokopedia）、移动支付及网约车生态；华为与万国数据则在 5G 网络部署与底层云计算中心建设上持续发力，极大提升了中资在印尼数字底座中的话语权。



共建“一带一路”以来中国对印尼直接投资规模强势攀升

数据来源：《2024 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2. “岛屿阶梯化”与“园区集群化”

由于地理环境的特殊性与经济发展的不均衡，中资在印尼的布局呈现出鲜明的空间差异与集群效应。

一方面是“岛屿阶梯化”的区域分工。在经济最为发达的爪哇岛，密集落户了汽车制造、家电电子、数字经济及大型民生基建项目；而在外岛地区，苏拉威西岛凭借得天独厚的红土镍矿资源，成为全球镍矿冶炼与电池材料投资的绝对核心区；苏门答腊岛与加里曼丹岛则依托煤炭与农林资源，吸引了大量能源电力与棕榈油精深加工项目。

另一方面是“园区集群化”的模式重塑。境外经贸合作区已成为中国企业成规模、抗风险落地的核心载体。以苏拉威西的青山工业园区、德龙工业园以及中印尼“两国双园”为典型代表，这种模式通过大企业牵头，在园区内统筹建设港口、电厂等重资产基建，不仅大幅降低了单体企业的“大基建”准入成本，更吸引了数百家产业链上下游的中小配套企业抱团入驻，成功实现了从“单兵突进”向“全产业链集群出海”的战略升级。

3. “国企+民企”双轮驱动格局

中国在印尼的投资阵列已形成优势互补的立体格局。国有企业作为“拓荒者”与“压舱石”，凭借雄厚的资金与融资优势，长期聚焦金额庞大、回报周期极长的核心基础设施（如雅万高铁、跨海大桥、超大型水利与电力工程）。大型民营企业（如青山控股、格林美、字节跳动等）则展现出极强的市场敏锐度与灵活性，成为矿产深加工、新能源制造与数字互联网消费等高度市场化领域的主力军。与此同时，大量中小企业正依托大型产业园区的溢出效应，以专业设备维护、物流配送、零部件加工及商务服务等形式嵌入本地生态，构筑了中资企业在印尼深耕发展的坚实底盘。

建成运营时间	项目名称	地位和作用
2025 年 9 月	南苏一号项目	国家能源集团在海外投资建设的煤电独立发电商（IPP）项目“第一单”
2025 年 1 月	加蒂格迪水电站	由中国电建总承包，中企在印尼承建的标志性水电工程之一
2023 年 10 月	雅万高铁	东南亚首条高速铁路，“一带一路”倡议的标志性工程和印尼国家战略项目
2023 年 6 月	米拉务燃煤发电项目	中国大唐集团在印尼苏门答腊岛亚齐省投资建设的境外首个绿地火电项目和当地唯一外资电力项目
2020 年 9 月	巴里巴鲁燃煤电站	中国能建葛洲坝集团海外实施的首

		个火电 EPC 项目
2020 年 9 月	爪哇 7 号火力发电厂	印尼单机容量最大、技术最先进的 高效环保型发电厂
2019 年 9 月	庞卡兰苏苏燃煤火电站	水电八局第一个负责运营的海外火 电项目
2018 年 2 月	塔卡拉燃煤电站	印尼第二批 1000 万千瓦电力快速 发展规划重点项目
2015 年 8 月	加蒂格迪大坝	印尼第二大水坝，能达 9 万公顷的 农田灌溉蓄水量
2012 年 11 月	巴淡 TJK 电厂	中国华电的首个海外投资运营项目
2009 年 6 月	洒水—马都拉大桥	印尼首座且最长的跨海大桥
2006 年 9 月	巨港电站	亚洲金融危机以来印尼建成的首个 商业电站

2006—2025 年中企在印尼投资参与的部分重大基建项目

数据来源：整理自中国商务部、国务院国资委（SASAC）公开通报、“中国一带一路网”官方数据，以及中国电建、中国能建、国家能源集团等相关参与企业的项目公开披露信息。

三、主要风险

总体而言，印尼市场正处于政策调整期，出海企业亟需建立穿透表象的风险识别能力。当前中企在印尼落地经营，主要面临三大风险。

（一）劳资纠纷与跨文化治理壁垒

劳工问题是中企在印尼公关危机的难题。中资项目特别是镍矿冶炼等高强度制造项目，容易因中外劳工薪资落差、安全生产标准、生活习惯差异引发矛盾。一旦劳资摩擦被炒作发酵，可能转化为群体性事件。部分中资企业因缺乏精通印尼语和熟悉当地文化的管理人才，导致微小摩擦处理欠妥。

（二）生态环保压力与社区利益分配冲突

随着印尼及国际社会对企业环境社会治理（ESG）标准日益严苛，中资重资产项目面临一定环保风险。部分企业因未完成环境影响评估（AMDAL）导致工作埋下隐患。部分中资企业在上述领域曾多次遭遇合规处罚或项目受阻的情况。此外，项目如涉及当地社区用地，若沟通协商不充分，易引发居民抗议和抵制。

（三）国际经贸规则调整与东道国政策变化

当前，中国企业在印尼面临一定地缘博弈外溢风险。比如，美国《通胀削减法案》（IRA）设定了严格的原产地与供应链溯源条款，对包含中国资本与技术的印尼镍产品进入北美市场形成一定限制，制约了中印尼新能源合作。同时，印尼政策的波动让企业面临挑战。例如，为缓解财政赤字，印尼出台资源型出口外汇收益强制留存国内银行的政策。加之《创造就业法》在执行过程中，地方政府的自由裁量权导致林地、用地许可审批长达6个月至1年，政策的摇摆削弱了企业对长期投资回报的稳定预期。

四、企业出海建议

综合研判，赴印尼投资及已落地的中国企业应注意：

1. 构筑全生命周期合规防线

印尼已不再是可供环保与劳工标准“套利”的低端洼地。企业必须坚决杜绝“花钱买息”或依赖个别地方官员背书的违规操作，而应严格按照法定比例聘用本地劳工，依法为外籍劳工办理各类许可与保险；在环保上，坚持高标准 ESG 信息披露。通过主动拥抱合规，将 ESG 指标从被动的“成本负担”转化为抵御 NGO 攻击与获取国际融资的“保护伞”。

2. 警惕非正式组织影响

企业需警惕打着“群众组织”或环保旗号的地方势力的非法袭扰。面对勒索，企业不可退让，应依托专业属地法务与印尼相关政府机构，寻求国家机器的保护；同时必须扎实做好核心周边社区的利益反哺（如教育医疗捐助）。

3. 警惕同业“内卷”

随着中国汽车、物流、茶饮等品牌密集涌入印尼，中资企业亟需摒弃内耗和“零和博弈”思维，通过行业协会建立错位竞争、技术标准互认与联合培训机制，转向基于

产业链生态的协同共赢。

4.深度本地化经营，构建“外向型”共生生态系统

一是人才本地化：建立“外籍替代”与“梯队培养”机制。企业必须将人才本地化作为消除信任赤字的核心。首先，企业可以设定强制“外籍替代”时间表，严格遵守印尼《关于外籍劳工的使用》规定。在建厂初期引入中国工程团队后，企业应制定明确的“3-5年过渡期”，通过“师徒制”将设备调试、技术移植等核心岗位逐步移交给印尼员工。其次，企业应建立跨文化中层团队，克服日常管理中的语言摩擦。企业需投入资源培养双语班组长，不能仅依赖少数印尼华人，应扩大对本土原住民干部的提拔比例。最后，企业还可以借力本地教育网络，通过借鉴华为、五菱汽车的经验，与印尼高职院校及宗教社群合作开展定向实训，将人才培养前置化。

二是供应链本地化：从“单向采购”转向“双向赋能”。企业应摆脱将印尼仅作为“组装车间”的短视行为。一方面，企业可以培育本土供应商，为印尼本地中小企业提供质量控制、技术标准培训。另一方面，印尼政府对技术转移极度渴求。企业可考虑将技术研发中心设在雅加达或万隆，以此争取税收减免和项目特批。

三是社区生态共生：将 ESG 转化为“价值创造项”。建议企业构建“社区发展委员会”机制。吸纳项目所在地的宗教人士、非政府组织代表加入委员会，同时在征地拆迁、环保评估阶段，实行透明化沟通。此外，企业应创新绿色循环经济模式，将企业的**废料**处理与当地乡村振兴结合，打造让印尼官方和媒体“看得见、愿意夸”的环保政绩。

5.全周期合规管理与风控举措

一是设立前置化合规过滤与尽调机制。企业应警惕“证后审批”陷阱。印尼的在线单一提交系统（OSS）仅为准入第一步。企业在获得矿业或工业许可后，绝不可违规提前动工，必须设立专职的“牌照与合规部”，耐心完成林地许可、环评（AMDAL）、建准（PBG）等耗时 6-12 个月的核心审批，避免面临停工或吊销执照的致命打击。

二是防范政策波动与地缘政治风险。一方面，企业要积极应对政策回溯与朝令夕改。针对印尼在矿业出口禁令、新能源界定（如近期将煤基燃料列入新能源）及强制外汇留存上的政策摇摆，企业在合同设计时应加入“不可抗力与政策变更保护条款”；同时，企业还需合理规划投资节奏，采取“小步快跑、分期投入”策略。

另一方面，企业需规避“反转运”与美国长臂管辖，必须实质性提高在印尼的本地化增值比例，确保满足原产地规则，留存完整的生产加工证据链，防范被认定为“规避关税的转运地”而遭遇高额双反制裁。

三是危机预警与处置：企业应建立和完善相关预警机制，每日监测社交媒体对本企业的舆情关键词（如工资、事故、污染）；一旦发生纠纷或安全事故，24小时响应，启动由印尼籍高管（而非中国高管）作为第一发言人的公关预案；此外，企业还应第一时间邀请地方警局、人力资源部官员或独立 NGO 介入调查并公布结果，用官方权威斩断“社交媒体谣言”的传播链。

6. 融入当地宗教文化语境

印尼 85% 的人口为穆斯林，在这一背景下，企业首先要严格遵守宗教合规。中资企业须在工厂设立祈祷室，保障穆斯林每日五次礼拜时间及周五主麻日祷告（Jumat）的需求。同时，企业可设立“媒体开放日”与记者沙龙，如向《罗盘报》（Kompas）、《雅加达邮报》（The Jakarta Post）等主流媒体及关键自媒体 KOL 开放厂区，展现企业真实的环保投入与劳工待遇。同时，对于涉及经济主权、利益分配等深层次问题，企业可考虑资助印尼高校和智库开展

联合研究，借学者之口客观阐述中资对印尼经济发展的实际贡献。

结 语

中印尼经贸合作已进入以“产业链重塑与高质量发展”为特征的“提质增效期”。印尼的宏观营商环境呈现出显著的“两面性”与“二元结构”特征。一方面，印尼的人口红利、庞大的内需市场以及基于“下游化”战略的产业政策红利具有较大投资潜力；但另一方面，其基础设施瓶颈、地方官僚体系、人力资源技能错配、民间对华认知等因素依然制约企业投资回报率。中国企业必须彻底摒弃“短期套利”思维，构建“政府-劳工-生态-社区-媒体”五位一体的深度本地化共生网络。

李丹 梅真华（复旦大学）

附:印尼涉外投资与营商环境核心法规和政策汇编

领域 分类	政策或法规 名称	颁布或 实施时间	对中资企业的核心影响与政 策要点研判
综合营商 与外资准入	《创造就业综合 法》	2020 年通 过，2023 年 正式修订生 效	全面松绑外资约束:将传统的 “负面投资清单” 转变为 “正 面投资清单”，大幅放宽外资 持股比例限制；简化审批流 程：企业开办时间从法定 23 天缩短至 7 天，施工许可审 批从 180 天减至 80 天；简化 外籍劳工的雇佣流程。
综合营商 与外资准入	第 25 号《投资 法》	2007 年颁布	建立外资基础法律框架:规范 外国投资活动的基石法律,对 最低投资资金要求、国外股权 限制、禁止投资领域和商业许 可要求作出了基础性规定。
能矿资源 与下游化	原矿出口禁令	2014 年首次 实施，2020 年全面恢复	强制全产业链留存:禁止未加 工镍原矿出口,强制要求矿业 企业必须在当地建设冶炼厂 进行加工。倒逼中资镍矿产业 链向印尼大规模转移。
能矿资源 与下游化	《矿产与煤炭开 采法》及煤炭 “国 内市场义务” (DMO)	2009 年颁 布，2020 年 重大修订	强化资源国家掌控:要求矿产 项目投产满 10 年后，须将控 股权转让给本土投资者;强制 煤炭生产商必须将年产量的 25%以限定价格优先供应印 尼国内市场。2020 年修订将 矿业审批权收归中央,降低了 地方政府的干预风险。

绿色能源 与电动汽车	《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法案》(草案) 及系列总统条例	2019—2020 年	强效双轨税收激励: 为可再生能源项目提供最高 20 年免税期及研发费用 300%税前抵扣, 允许外资在地热等领域 100%控股; 对电动车企业提供 “5+5” 税收优惠 (前 5 年全免, 后 5 年减半) 及关键设备进口关税豁免; 为消费者提供约 700 万印尼盾的电动摩托车购车补贴。
经济特区 与重大基建	《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 (印尼投资优先清单)	近年来持续 修订 (如 2024 年)	对定点区域实施优惠: 对进入国家级经济特区 (如巴塘工业园) 及新首都 (努山塔拉) 建设的外资企业, 提供最高达 100%控股权、最高可享 20 年的企业所得税免税期及进出口关税豁免。
劳工合规 与环境保护	《关于外籍劳工的使用》	2021 年颁布 (第 34 号政府条例)	划定本地化雇佣红线: 规定外籍劳工上岗必须优先满足 “本地劳工无法胜任” 的前提; 外籍劳工工作超 6 个月需注册国家保障计划, 不足 6 个月需购买商业保险。
劳工合规 与环境保护	《环境保护与管理法》	2009 年颁布 (第 32 号法), 后经 综合法修订	实施环保领域的 “一票否决”: 要求投资项目必须完成严格的环境影响评估 (AMDAL) 及多部门审批, 违规 “先建后批” 或环保不达标可能面临罚款、停工乃至吊销执照。
数字经济 与前沿产业	“印尼数字路线图 2021—2024” 及 “工业 4.0” 路	2018 年、 2021 年分别 推出	顶层战略指引: 大力吸引数字基建投资, 为中资企业参与 5G 网络、数据中心底层算

	线图		力、跨境电商生态及电子支付建设提供国家级战略背书。
--	----	--	---------------------------

数据来源：整理自印度尼西亚投资部（BKPM）、能源与矿产资源部（ESDM）、人力资源部等印尼政府官方发布文件，并参考中国商务部《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指南：印度尼西亚》（2024 年版）及中国驻印尼大使馆经商处公开信息。

文献来源

本报告采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研究路径，核心数据与分析基准全面依托国内外官方机构、国际权威组织以及主流媒体的大数据挖掘。具体来源如下：

1.宏观经济与双边投资贸易数据

(1) 中方官方统计：中国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外汇管理局历年联合发布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数据截至 2024 年度）；

(2) 驻外机构发布：中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馆经济商务处公开披露的经贸与投资数据；

(3) 印尼官方统计：印尼中央统计局（BPS）发布的宏观经济与人口统计数据。

2.国际营商环境与竞争力评估基准

(1) 世界银行（World Bank）：《营商环境成熟度评估》（2006—2020 年营商环境指数排名）、全球物流绩效指数（2023 年）；

(2) 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IMD）：《国际竞争力排名》（2021—2025 年综合竞争力、政府效率、商业效率、基础设施得分与排名）；

(3) 透明国际 (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 全球清廉指数 (CPI) 排名。

3.涉华舆情大数据量化挖掘 (2006—2024 年) : 数据来源于对印尼五大主流新闻媒体平台的定向数据爬取, 包括: Kompas (《罗盘报》)、Kontan (《金融报》)、Bisnis Indonesia (《印尼商业报》)、Detik、The Jakarta Post (《雅加达邮报》) ;

4.印尼官方政策、法规与产业准入文件

(1) 政策发布部门: 印尼投资与下游化部 (BKPM)、印尼工业部等;

(2) 核心法律法规: 整理自印尼政府官方公开文件, 包括《创造就业综合法》 (Omnibus Law)、《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 (正面清单)、第 25 号《投资法》、《矿产与煤炭开采法》、《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法》及相关原矿出口禁令等。

5.特定产业与资源权威数据库

(1) 美国地质调查局 (USGS) : 2014—2024 年印尼镍矿开采量及全球储量占比数据;

(2) 印尼能源和矿产资源部 (ESDM) : 2014—2023 年印尼煤炭产量和出口量数据;

（3）国际性智库与数据库：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以及 Statista 全球统计数据库。



联系地址：淮海中路 622 弄 7 号 308 室

联系电话：021-33165460

联系邮箱：zbzh@sh-popss.gov.cn

本报告为研究团队基于公开信息、行业调研、数据分析及专业研究方法独立编制完成的研究成果，仅供行业研究、学术研讨、决策参考交流使用，不构成任何商业、投资、法律、财税及其他专业实操建议。报告免费获取，未经书面正式授权，任何机构及个人不得擅自转载、复制、篡改、摘抄、传播本报告全部或部分内容。